

后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与唐及东部诸族关系考

李荣辉

(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学系,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)

[摘要] 安史之乱时,原藏于内廷中的档案、实录、国史等焚烧殆尽,因此,流传后世的后突厥汗国末期的史料不多。再者,两《唐书》等关于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的记载晦暗不清,时有抵牾。因此,有必要对后突厥汗国史料进行细致梳理和研究。本文通过对后突厥汗国末期突厥与唐及东部诸族史料的梳理,并参考墓志对具体史事进行考证,探析了后突厥汗国走向衰亡的过程。

[关键词] 后突厥;唐代;东部诸族;民族关系

[中图分类号] C951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1-5140(2017)02-0013-05

后突厥汗国自骨咄禄起事以来,经默啜东征西讨到毗伽可汗之时,势力已达极盛,阙特勤碑记载:“我把四方的人民全部征服了,使其不再为敌。他们全部臣服于我,并(为我)出力。”^[1]开元十九年(731年)阙特勤卒,此为后突厥汗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。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毗伽可汗被其梅禄毒死,其子伊然可汗立,无儿,伊然可汗死,又立登利可汗。登利可汗与其母诱杀西杀引起突厥内乱,自己也死于非命,随后的几位可汗在位时间极短,天宝四年(745年)白眉可汗为回鹘怀仁可汗所杀,后突厥汗国灭亡。后突厥汗国灭亡固由其内乱所致,而唐的作用也不可忽视,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:“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,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,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,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。”^[2]

一、开元十八年契丹叛唐后突厥与唐及东北诸族关系

开元十八年(730年)五月契丹首领邵固为可突于所杀,契丹挟持奚降于突厥,随后寇平卢,平卢军先锋使乌承玘破之于捺禄山,其年秋“幽州长史赵含章发清夷军兵击奚,破之”^[3]。《册府元龟》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条下有契丹、奚遣使朝贡的记载^[4],此当为赵含章破契丹、奚的结果。开元十八年两次作战,唐军每次作战仅幽州节度使、平卢节度使的军队,因兵力不足,并没有完全消灭两蕃,契丹、奚余部北窜至黄河(今西拉木伦河)、泾山(今大兴安岭南段)一带据险自保^[5]。此后唐虽有小规模军事行动,如开元十九年(731年)八月《裴光庭贺幽州执奚寿斤表》载“幽州执叛奚寿斤来献”^[6],总体来说双方呈对峙态势。为讨伐两蕃,唐廷于关内、河东、河南、河北四道招募勇士,以忠王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,率十八总管讨伐契丹、奚,后忠王未成行,以信安王祹代为主帅。开元二十年(732年)三月李祹与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征讨两蕃,初两蕃以诈退之计引诱唐军,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先败于白城,后乌承玘引别兵出其右,破之^[7]。此事见于李永宣墓志,其曰:“廿载,节度使赵含章使君统马军大入,于是梁北河,屠白城,犁乌桓

[收稿日期] 2016-12-14

[基金项目]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项目“内蒙古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”(项目编号: B20161012618Z)

[作者简介] 李荣辉(1978—),男,山东青岛人,在读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研究。

廷,艾鲜卑首。”^[8]三月己巳,信安王祎大破两蕃,可突于远遁,余党窜入山谷,奚酋长李诗锁高以五千帐来降^[9]。关于唐廷征讨两蕃之时的突厥动向,《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》载“其突厥分兵,助为声援……贤王失阵”^[10],唐代常以匈奴来指代突厥,贤王应指突厥的“杀”,唐朝在开元二十年(732年)征讨两蕃之初,突厥应参与这次战役,并被击败。

突厥与唐在边境冲突之前,两国交好,开元十五年(727年)九月吐蕃约以抄边,时突厥请娶唐朝公主,以在北族中树立威信,乃以吐蕃之书献于唐,而唐为笼络突厥在西受降城互市,每年以帛数十万遗之。此后两国频派使者,开元十九年(731年)十月,突厥大臣苏农出罗达干等来朝^[11],达干(Tarqan)是突厥专统兵马事的武官,为突厥政权中的重要人物。开元十九年(731年)三月阙特勤卒,十一月金吾将军张去逸入突厥弔祭,《通典·职官》记载左右金吾卫品级正三品,张去逸为玄宗之母的外甥、忠王李亨的岳父,双方互派使节的品级还是相当高的。唐与突厥发生冲突之后,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因这次冲突而受影响,开元二十年(732年)“七月庚子,突厥可汗堂弟何支监捺来朝”^[12]。但在和平邦交的同时,因两蕃引发的边境冲突依然不断,同年唐玄宗赏赐降奚时,“时突厥及室韦果勒兵邀险,谋劫持之”^[13]。

开元十三(723年)年冬,契丹首领契丹邵固扈从东巡,其还蕃后,遣权臣可突于入朝贡献方物,中书侍郎李元纘对其不加礼遇,开元十八年(730年)可突于杀邵固,并胁迫奚一起复降突厥。开元二十年(732年)信安王祎与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大破契丹,可突于远遁,奚又附唐。《毗伽可汗碑》载,“当我五十岁时,奚人民脱离契丹去”^[14],“奚人民归顺唐朝皇帝。我因其不派使节、不致问候。乃于夏天出征”^[15]。奚李诗部投唐后第二年(733年)突厥与契丹联合犯塞,《旧唐书·契丹传》载:“明年,可突于又来抄掠。”^[16]此次抄掠看似为契丹余部的单独行为,但从薛楚玉露布中可突于“而西联匈奴,东拘渤海,收合余烬,窥我阿降奚”^[17]。《毗伽可汗碑》记载,这次军事行动是毗伽可汗为讨伐投唐之奚而发动的。“当是时也,四蕃云屯,十万雨集”^[18],四蕃当指突厥、契丹、奚、渤海,此战唐军先以七千人马以少胜多,“黜之碛石,斩单于之爱子”^[19]。唐军后以降奚为主力乘胜追击契丹余众,俘获甚多,四月二十五日南还,二十七日到达乌鹊都山,此即《薛楚玉露布》所作时间。唐军在都山“椎牛买酒,散赏高会”,契丹余众与突厥袭唐,左卫将军、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战死。唐军此次出征以降奚为主力,杂有黑水扶余,故有“既以蛮夷出攻”之语,后“奚众遂持两端,散走保险”^[20],唐军遂大败。《毗伽可汗碑》载“郭(Qugh)将军领四万军而来。我在 Tüngär 山袭击之。”^[21]Tüngär 山即《旧唐书》中记载的都山,都“《广韵》当孤切端模合一平遇 * tu”^[22],汉文文献中的都山应为 Tüngär 的节译。碑铭又说毗伽可汗长子病死时,把郭将军立为杀人石,郭楚玉露布中有“斩单于长子”之言,毗伽可汗长子很有可能参加了这次战争并受伤死去,突厥葬俗“于墓所立石建标,其石多少,依平生所杀人数”^[23],毗伽可汗遂以郭英杰为其长子立杀人石。此役不久,奚王李诗死,其子延宠又叛。开元二十一年(733年)唐以张守珪为幽州长史,并于六月大破奚,其墓志曰,“公始至幽府,□降奚叛亡……斩首擒王”^[24],奚复降,《敕投降奚等书》有“比严寒”之语^[25],此次复降当为秋末。奚投降之初,契丹阻险自保,《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》云:“今奚贼残破,固不足言,契丹余孽,犹且为梗。”^[26]后因张守珪的军事压力,可突于渐向西北方向移动,欲投靠突厥。可突于既臣服于突厥,又因突厥征发而派遣使者与唐媾和,契丹内部亦分为两派,最终张守珪派王悔劝说李过折除掉契丹王屈刺、可突于及其余党,契丹归降。

突厥对东方部族的管理,在前突厥汗国时代是派土屯进行羁縻统治,《隋书·契丹传》:“突厥沙钵略可汗,遣土屯潘垓统之。”^[27]室韦也是如此,《隋书·室韦传》:“突厥常以三土屯总领之。”^[28]土屯突厥语为 tudun,《出御史台》载:“置御史为冷峭,而突厥号御史为吐屯。”^[29]以御史之责观之,土屯应为突厥派遣到附属部落中征发兵马、课税并监视这些部族国政的官员。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即位初期,因突厥内乱,其对东方部族的控制力有所减弱,黑水靺鞨虽在默啜可汗时期曾到突厥请土屯,开元十三年(725年)唐在此设立黑水都督府,自此朝贡不绝。黑水靺鞨之外又有越喜、铁利、拂涅靺鞨等部,这些部落开元年间与唐保持着朝贡关系。《册府元龟·外臣部》既有越喜靺鞨,又有越嘉靺鞨,此“越喜”靺鞨或为“越嘉”之误。据《册府元龟·外臣部》记载,渤海国“西接越喜靺鞨,东北至黑水靺鞨”^[30],《旧唐书·渤海传》与之同,但下有脱文,《辽史·地理志》载信州“本越喜故城”^[31],信州在今吉林怀德县,越喜部当在

此。另据郎实活墓志载,其本为加部落鲜卑人,后附唐,墓志中有“虽远蕃黑水,尝报汉赤诚”^[32]之语,黑水应指黑水府所辖诸部,加部与《乌氏庙碑铭》中的黑水室韦^[33],《薛楚玉露布》中的黑水扶余^[34]当为同一部落,与汨字形相近,似为汨之别字。据《广韵》汨“于笔切臻撮合口重组三等云母,王力 * yiwēt”^[35],越“王伐切云开合三入山 * yiwet”,加与嘉声纽与韵撮相同“古牙切见麻开二平假 * ka”^[36],从译音上看汨加与越嘉基本相同,而从文献上看,两者地域亦相差不远,郎实活墓志中的加部应为渤海国以西的靺鞨越嘉部。郎实活在“属林胡不宁,首首背伴”之际与子沮礼等率众投汉,林胡在唐代多指契丹,越嘉部位于今吉林怀德县,正与契丹接壤,此事发生于开元十八年(730年)可突于挟持诸部投靠突厥之时。

毗伽可汗时期与突厥关系密切的东部诸族有室韦,《旧唐书·刘全谅传》“开元中,有室韦首领段普恪,恃其骁勇,数苦边;节度使薛楚玉以客奴有胆气,令抗普恪”^[37]。按《旧唐书·室韦传》室韦分为九部,活动在最西部的为岭西室韦活,其地域为讷谟尔河、乌裕尔河、嫩江县东,小兴安岭以西^[38],岭西室韦与突厥接壤,开元二十年(732年)突厥、室韦谋劫唐朝赏赐奚丝绢,此即岭西室韦。可突于叛唐之时,渤海因黑水部靺鞨及大门艺降唐之事与唐关系紧张,而趁乱分兵两路犯边,一路渡海抄掠登州,另一路兵至马都山,平卢先锋军乌承玘以石塞其道,流民得以安定,唐与新罗遂有开元二十年(732年)讨伐渤海之举。契丹与渤海之间关系始自李尽忠时期,大祚荣本高丽别种,高丽灭亡乃迁居营州,李尽忠死后,李楷固讨契丹余党,而大祚荣即为余党之列,此时大祚荣应附属于契丹。渤海在东牟山建国之后,为对抗唐朝,“遣使通于突厥”^[39],并与黑水靺鞨到突厥请土屯。《阙特勤碑》中吊唁者有日出之方的 būkli cō(l) ligil, il 国家、部族之意,耿世民先生译 būkli 为莫离,指东北地区操满一通古斯语的民族, cōl 为突厥语中的蒙古语借词,意为荒原,因此译 būkli cō(l) lig il 为莫离荒原人,护雅夫氏 būkli 读作 bōk eli 貂之国^[40],岩佐诚一郎氏、亨宁(W. B. Henning)、岑仲勉先生推定为高丽,森安孝夫氏则认为与其是岩佐氏所认为的 Bō(k) + kli 貂 + 句丽,不如 Bōk + lig 更合理一些,貂(Bōk)加尾词 lig,辅音 g 脱落后为 būkli 即貂国(人),而此时高丽已经灭国,此貂国当指渤海国^[41]。森安氏把唐礼言《梵语杂言》中高丽的梵语音写亩俱理,即伯希和敦煌藏书 P·t1283 藏文卷子中“突厥人称之为 Mug-lig,汉人称之为 Ke'u-li”,与突厥碑铭中 būkli 勘同,《广韵》亩俱理 * mēu giū liē^[42],与 būkli、Mug-lig 读音接近。突厥语 b 中在翻译成汉语时可以用 m 代替,《太平寰宇记》中“突厥名鱼为磨勒”,磨勒 * muo lək,据克劳森(Sir Gerard Clauson)词典 balik 在古突厥语中即鱼之意^[43]。cō(l) lig 亨宁比定为高丽,克劳森认为可能是位于韩半岛上一个小政权,芮传明先生拟定为叱利^[44]。从地理位置而言, būkli cō(l) lig 位于日出之东方,此时高句丽已经灭亡,较大的政治实体只有黑水靺鞨与渤海。渤海西部、高句丽之地本称濊貂之地,《三国志·扶余传》曰:“国有故城名濊城,盖本濊貂之地。”^[45]高句丽亦称貂,《后汉书·高句丽传》曰:“句骊一名貂,有别种,依小水为居,因名曰小水貂。出好弓,所谓‘貂弓’是也。”^[46]《隋书·百济传》载:“百济自西行三日,至貂国云。”^[47]此貂国即高句丽别种小水貂,此部落在隋时还存在。大祚荣本高丽别种,又以高丽继承者自居,因此其自称貂高丽并非没有可能。《广韵》“貂高丽 * mēk kau liei”^[48],无论从语音上还是从史料记载看, būkli 与貂高丽堪同较为适宜。cō(l) lig 从语音上无法找到与其对应的民族,《旧唐书》书中有黑水靺鞨与渤海同去突厥请土屯之举,黑水靺鞨共有十六部, cō(l) lig 似可拟定为黑水靺鞨中的一部。《薛楚玉露布》中可突于“而西联匈奴,东拘渤海”,后又有“从散约解”之语,开元二十年(732年)渤海犯边应是与突厥、两蕃的联合行动。

开元二十一年(733年)都山之战虽以唐军大败而告终,但此战并没有中断突厥与唐的交往,《新唐书·突厥传》载“莫棘连请昏既勤,帝许可,于是遣哥解粟必来谢,请昏期”^[49],《册府元龟·朝贡》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四月突厥大臣斯壁、纥思鲜阙来朝^[50],《册府元龟·和亲》:“三十二年四月突厥遣使来朝……仅使可解粟必谢婚。”^[51]开元无三十二年,应为二十二年之误,此应与《册府元龟·朝贡》中的遣使为一事。“《广韵》粟必 * sīwok piēt,斯壁 * sīe piek”,可 * k'a,哥 * ka。”^[52]《册府元龟》中的可解粟必即《新唐书》中哥解粟必,粟为粟之讹。唐玄宗在《敕突厥毗伽可汗书》曰:“自为父子,情与年深,中间往来,亲缘义合。虽云异域,何殊一家。”^[53]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十一月毗伽可汗被其梅录毒死,“帝悼之,为之辍朝三日,敕曰:情义所在,礼固随之,岂限华夷”^[54]。虽然诏书语言属外交辞令,但从中还是能看出

唐与突厥的密切关系。

二、登利可汗时期的突厥外交政策

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冬毗伽可汗被其梅录毒死,其子伊然可汗立,玄宗派宗正卿李佺弔祭毗伽可汗,并册立伊然可汗^[55]。李佺未到突厥之时,伊利可汗病死,开元二十三年(735)春初《敕突厥可汗书》中的突厥可汗已是登利可汗。路易·巴赞(Louis Bazin)通过对突厥历法的研究得出毗伽可汗死于突厥历狗年10月26日(儒略历734年11月25日),葬于突厥历猪年5月27日(儒略历735年6月22日)^[56],《敕突厥登利可汗书》曰:“今又遣从叔金吾大将军佺持节吊祭,兼营护葬式……春中尚寒。”^[57]春中当为阴历二月,此时李佺方去突厥,故《旧唐书》所言李佺册立伊然可汗有误,《新唐书》载“伊然可汗立八年,卒…使右金吾卫将军李质持册为登利可汗”^[58],亦误。毗伽可汗死后不久,突厥即派哥利施颀斤到唐报丧,并请葬料,唐玄宗以其从兄、宗室之长李佺持节吊祭,双方保持着高规格的外交关系。对于两蕃投唐一事,突厥一直耿耿于怀,李佺在处理毗伽可汗葬礼期间就探听到突厥准备东下讨伐两蕃,葬礼完毕后不久,突厥即倾国而出,讨伐两蕃。突厥讨伐两蕃之前曾通报唐朝,《敕突厥可汗书》云:“儿去年东讨,虽有先言,然两蕃既归国家,亦不合侵伐。”^[59]突厥讨伐之前,张守珪因俘获突厥生口而具知此事原委,唐廷对于此事的处理是突厥胜两蕃“若因而屠之,亦便除患”^[60],两蕃若获胜“北虏势衰,因而乘之,灭其大半”^[61],对突厥的行动采取默认的方式,同时戒东北军不可轻动,以免与突厥结怨。突厥此次行动亦曾照会渤海,《敕渤海王大武艺书》曰:“突厥遣使求和,拟打两蕃。”^[62]渤海把此事通报唐朝,并欲扣押其使者,由此事可知,唐与渤海关系得到恢复。

突厥东征之时,奚部衙官褥云勾结突厥,意欲图谋奚都督李归国,被李归国诛灭。契丹涅礼首先率部击败突厥,唐又指示奚都督李归国与契丹相为腹背,待其归师之时,逐要追袭;而对平卢节度使的敕令则曰:“若见可行,务须尽敌……必图万全,不可轻举。”对张守珪的敕令是“孰料万全,然可邀击,蕃汉相杂,使其莫辨”^[63]。据《贺破突厥状》平卢节度使兵力参与了对突厥的追击,突厥死伤惨重。唐在此事中开始仅令边将备边,防止突厥抄掠,对于突厥与两蕃之间的争斗并未派出援军;在契丹击败突厥之后,始令唐军邀击,且使蕃汉相杂,让突厥不能分辨。此役的结果是两蕃大破突厥而结下仇怨,突厥登利可汗新即位及遭大败,在突厥内部威信扫地,其兵马平章事第一人死于此役。在此事件中唐从表面上看没有直接与突厥发生冲突,实际上为此役的背后策划者,对此事件的处理也显示出唐以夷制夷的边防策略。不久契丹又叛,直至天宝四载突厥汗国灭亡之后,契丹李怀秀才重新归唐。

毗伽可汗之时每岁纳马三四千匹,登利可汗即位之初,两年之内交易马及其它杂畜五十万匹,此贸易成为唐的沉重经济负担,遂以交易马匹以劣马混杂其中,而退回一部分。登利可汗新立,急需通过赏赐来笼络人心,对两蕃的征伐以失败而告终,既无抄掠所得,绢马贸易则成为其重要的经济支柱。唐表面以绢马贸易羁縻突厥,内实忌之,《敕平卢使乌知义书》曰:“突厥去岁东侵,已大不利,志在报复,行必再来……蕃汉诸军,须有严备。”^[64]又敕登利可汗欲使其放弃征讨两蕃,与唐军合力破突骑施。

三、登利之死与突厥灭亡

登利即位之初,其从叔父为左右两杀,并控制了大部分兵马,登利与其母合谋除掉西杀,尽并其众,契丹趁乱从突厥逃回者言“黄头突厥与默啜突厥争言气,^①兵马欲斗”^[65]即此事,右杀统突厥西部之部落,黄头突厥当指右杀。不久左杀判阙特勤攻杀登利,立毗伽可汗子为可汗,开元二十九年(741年)秋七月“突厥遣使来告登利之丧”^[66],登利之死应在七月左右。不久骨咄禄叶护杀新可汗,立可汗弟,旋又

^① 默啜死后外族仍称突厥为默啜突厥,见森安孝夫.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——DRU-GUとHOR.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, 1977, (14).

杀之,自立为可汗^[67]。突厥内乱之时,唐玄宗命孙老奴招谕回鹘、葛逻禄、拔悉密等部落,天宝初这三部攻杀骨咄禄,突厥余众立判阙特勤子为乌苏米施可汗。王忠嗣墓志中载“阿波达干持爱妾宵遁,乘六羸突围,啸聚东蕃,胁迫小种”,此时突厥的政治中心应离开郁都斤山,向东驻牧以避拔悉密等。契丹于天宝四年方降唐,《旧唐书·王忠嗣传》载其屡与奚怒皆部交战,可知“啸聚东蕃,胁迫小种”乃契丹、奚等东部部族。时王忠嗣盛兵碛口以威振之,玄宗遣使者招谕内附,乌苏米施同意降唐,但迟延不至,王忠嗣遂与拔悉密合兵攻之,乌苏米施可汗遁走,突厥西叶护阿思布、乌苏米施子西杀葛腊哆等五千余帐降唐。天宝三年(744年)拔悉密攻杀乌苏米施可汗,突厥余众立其弟为白眉可汗,王忠嗣自单于台北伐,破其左厢十一部;明年,突厥右厢为回鹘等九姓铁勒所破,白眉可汗被杀,东突厥汗国亡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[14][15][21][40]耿世民.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[M]. 北京: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2005. 129,165,163,165,165.
- [2]陈寅恪.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. 128.
- [3][16][20][39]刘昫等. 旧唐书·卷一九九下·北狄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 5356,5353,5353,5360.
- [4][11][12][北宋]王钦若. 册府元龟·卷九七一·朝贡四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 11408,11409,11409.
- [5][10][17][18][19][唐]樊衡. 文苑英华·卷六四七·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6. 3331.
- [6][清]董浩. 全唐文·卷二九九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 3030.
- [7][9][宋]司马光. 资治通鉴·卷二一三[Z]. 胡三省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 6797-6798,6798.
- [8]吴钢. 全唐文补遗(第五辑)[Z]. 西安:三秦出版社,1998. 391.
- [13]裴耀卿. 旧唐书·卷九八[Z]. 3080.
- [22][36][42][48][52]郭锡良. 汉字古音手册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0.
- [23][唐]杜佑撰. 通典突厥上[Z]. 王文楚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 5404.
- [24]吴钢. 全唐文补遗(第六辑)[Z]. 西安:三秦出版社,1998. 62-63.
- [25][26][53][57][59][60][61][62][63][64][65]张九龄. 张九龄集校注[C]. 熊飞校注. 北京:中华书局 2008. 549,543,625,631-632,633,726,726,582,566,586,760.
- [27][28][唐]魏征. 隋书·卷八四·北狄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 1882.
- [29][宋]李昉等. 太平广记·卷二五〇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1. 1935.
- [30][50]册府元龟·卷九五九·土风一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 11286,11286.
- [31][元]脱脱. 辽史·卷三八·地理志二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 470.
- [32][34]吴钢. 全唐文补遗(第四辑)[Z]. 西安:三秦出版社,1997. 439.
- [33][唐]韩愈. 韩昌黎文校注[Z]. 马其昶校注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. 397.
- [35]林连通,郑张尚芳. 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[M]. 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12. 734.
- [37]刘全谅. 旧唐书·卷一四五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 3938.
- [38]张久和. 原蒙古人的历史——室韦达怛研究[M]. 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8. 74.
- [41]森安孝夫. チベット語史料中に現われる北方民族——DRU-GUとHOR[J].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, 1977, (14).
- [43]Sir Gerard Clauson.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-Thirteenth-Century Turkish[M].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2. 335.
- [44]芮传明. 古突厥碑铭研究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. 175-180.
- [45][晋]陈寿. 三国志·卷三十·扶余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 842.
- [46][刘宋]范晔. 后汉书·卷八五·高句丽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 2814.
- [47][唐]魏征. 隋书·卷八一·百济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 1820.
- [49][58][67][宋]欧阳修,宋祁. 新唐书·卷二一五下·突厥下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 6054.
- [51][54]册府元龟·卷九七九·和亲二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 11504,11455.
- [55]刘昫等. 旧唐书·卷一九四上·突厥上[Z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 5177.
- [56][法]路易·巴赞. 古突厥社会的历史纪年[M]. 北京:中国藏学出版社,2014. 235.
- [66][宋]司马光. 资治通鉴·卷二一四[Z]. 胡三省注. 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 6844.

(责任编辑 贺卫光 责任校对 戴正)